

高鐵要快 離不開「一地兩檢」

顧敏康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顧敏康

高鐵香港段項目是否採取「一地兩檢」引起社會廣泛討論。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日前透露「一地兩檢」的具體構思，包括正積極研究是否將相關內地法律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容許內地執法人員在本港特定範圍內執行內地法律。本文贊同「一地兩檢」符合高鐵和市民最大利益的說法，並認為「一地兩檢」屬於法律技術問題，應該可以通過有關法律途徑得以解決。

實現高鐵快速便利功用

眾所周知，「高鐵」是高速鐵路的簡稱，其車速為普通鐵路的2至3倍。高鐵的出現，大大節省了人們的旅程時間，為商業往來和旅遊觀光帶來極大的便利和效率。在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快速」便是高鐵與普通鐵路的最大區別所在。因此，高鐵香港段貫通後，是實行「一地兩檢」還是「兩地兩檢」，關係到高鐵能否高速運營的問題。由於從西九龍總站到福田站車程約為14分鐘，如果實行「兩地兩檢」，就意味着旅客在西九龍站完成出境手續並登上高鐵後，14分鐘後又要在福田站重新在內地關口過一次關。如此折騰，肯定要浪費許多時間。這既不能體現出高鐵之高速特點，也會使整條高鐵喪失應有的意義，體現不出相較「港穗直通車」的優勢。

第二種方案是：旅客在西九龍站完成出境手續並登上高鐵後，由內地執法人員從西九龍站到福田站的14分鐘內完成入境內地、海關及檢疫手續。但是，由於每列高鐵可載約579名乘客，是否能夠在14分鐘內完

成這些手續，顯然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而公民黨提出所謂「折衷」方案也是值得商榷的。他們建議以福田站為目的地的乘客下車後在車站內做檢查，至於以廣州南站為目的地的乘客，則由駐在車上的內地官員檢查。但這種方案也沒有解決以福田站上車的旅客如何與香港至廣州的旅客加以區分的問題。如果採用車廂分隔的辦法，則無法體現高鐵之經濟效益。

第三種方案就是「一地兩檢」了，即旅客在九龍站同時完成香港出境和內地入境手續，這樣就大大節省了高鐵的執行時間，實現了高速和便利的目的。誠如有關人士指出：「一地兩檢」的意義，是國家的出入境關口南移到香港境內。任何人在內地高鐵站買一張票可以直達九龍，同樣地，任何香港人可以買一張票直達內地各個城市。

「一地兩檢」之法律解決途徑

問題是，「一地兩檢」涉及內地執法人員在香港境內執行內地法律，這樣做是否會違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方針？本文認為不會，並且認為這是一個法律

技術問題，不應該過分政治化。

首先，在「一國兩制」前提下，「一地兩檢」早有先例。2006年10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實施管轄的決定》，授權香港政府於深圳境內的港方口岸區範圍內實行全封閉式管理，實施香港法律，並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執法人員管理。既然這種模式已經被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為什麼不可以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將這種模式搬入西九龍站呢？換句話說，「深圳灣模式」就是在香港境內的內地口岸範圍內實行全封閉式管理，實行內地法律，並由內地執法人員管理。這種特定範圍、特定執法的模式，只要法律規定明確，管理得當，應該不會出現內地執法人員隨意跨界執法之情況。

其次就法律角度而言，這種技術性的安排也完全可以通過法律去合理解決。基本法第18條第三款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徵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列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這裡的關鍵就是，大家拋開不同政見，形成共識。至於有人提出「高鐵項目是特區內部事務」，不能適用基本法第18條第三款規定。這是不正確的說法。誠然，高鐵項目香港段是屬於特區內部事務，但是，「一地兩

檢」涉及內地執法人員在香港特定封閉範圍內執法，應該「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

凝聚共識豐富「一國兩制」實踐

可見，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根據基本法，在廣泛諮詢的基礎上，制定有關《關於內地執法人員在香港境內九龍總站的內地口岸實施管轄的決定》。為了消除社會的顧慮，可以對內地執法人員的執法內容進行具體規定，並對內地執法人員可能違反有關規定的情況列出具體處罰方法，以確保在香港順利實現深圳灣口岸的「一地兩檢」運行模式。

至於那些認為「一地兩檢」會破壞「一國兩制」的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只要不是將「一地兩檢」上綱上線、或絕對政治化，法律上的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首先，「一國兩制」需要平衡「一國」與「兩制」的關係，不應過分偏重，導致失衡。其次，「一國兩制」需要創造好的先例。基本法起草者應該沒有預計到今日的「一地兩檢」問題，但是，只要是為了兩地人民的福祉，就應該創造一些好的先例。再者，筆者也不同意有些人土的「擔憂此例一開，日後中央將以同樣方式引入其他內地法例」的說法。只要法律規定明確，就不會出現口子拉開的情況。希望反對派「一事對一事」，不要無限演繹和誤導民眾。

政治小丑「周身屎」令人噁心

梁新

會計界議員梁繼昌在出席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會議期間，突然發現座位鍵盤底部有穢物，致使其牛仔褲膝蓋處弄髒一大片，「聞到好大陣惡臭」。梁初步懷疑是人類或動物糞便。梁繼昌「中招」令不少議員感到驚訝，有議員要求立法會調查事件，否則日後有人可裝毒藥、炸彈、刀片，隨時傷人。

開會開到「成褲都係屎」確實令人噁心，卻不及某些議員「周身屎」還充當正義之士令我們噁心。某些所謂「民主鬥士」，本身是律師，卻不尊重法治，頻頻配合激進派議員拉布，浪費公帑，又在「佔中」期間「為民請命」，以自己所謂的「專業資格」指點「佔領」人士如何破解法庭頒發的禁制令。某些反對派議員不僅在議會內經常搞事，更在議會外涉嫌教唆一些無知市民，申請法律援助，然後針對大型基建項目提出司法覆核，達到阻礙和衝擊政府施政的目的。

某些反對派議員爭取所謂「民主」和「工人權益」時永遠走在最前線，表面上是為民請命，卻不斷被揭背後收受「黑金」，多年來收取美國民主基金會數以千萬計的款項。某些反對派議員開會也不是開會，他們的整副心思不是花在如何為議會提出真知灼見，令議會進程變得暢順，而是千方百計扭盡六壬去想出種種的所謂「拉布方法」，拖延議會進度，令立法會「流會」。這些議員絕不會因為流會浪費議員時間，浪費大量公帑而感到惋惜或內疚，反而認為自己的策略「成功」而沾沾自喜。

立法會議員身份受人尊重。但某些反對派議員在議會內外的表現，其粗鄙程度比之坊間的「爛仔」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議會內，他們不停搞惡作劇，作「政治表態」，不僅「出口傷人」，還擲物、掃走官員名牌；有人更大膽走向特首跟前問特首「幾時死」；在議會之外，這些人經常同激進分子「埋堆」，策劃各種暴力衝擊行動來增加香港的內耗，挑動社會對立及激化矛盾。從他們的行為來看，莫說是擔任議員，恐怕連做保安亦未合資格。

某些議員「講一套，做一套」，表面上是「正義超人」，實質是「周身屎」的「政治小丑」，冷眼看着這些議員在熒幕前聲嘶力竭地「扮嘢」，觀眾實在有打爛電視機的衝動。

梁繼昌議員身上的糞便一定可以洗去，但「周身屎」議員身上的「糞便」卻怎樣也洗不掉，這是他們的人生污點，會跟隨他們一輩子。

社會各界對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討論沸沸揚揚，一些活躍網民尤其關注。可惜的是，很多討論都是偏離事實的，並無助於草案的完善。

作為負責任的公民，在討論政策前應該對該政策有清楚認識。以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為例，其訂立目的根本宗旨是為了保障原創作者的版權利益，這類型的法案，在全世界發達地區很普遍，如特區政府遲遲不在保障知識產權方面加強立法，恐怕予人保護知識產權不力的形象。

事實上，網絡世界無遠弗屆，現時網民的行為幾乎不受監管，一些關乎版權持有人利益的侵權行為十分普遍。筆者認為，網民們除了關心自己的二次創作及分享自由外，也應該考慮到版權持有人的實際利益，否則的話，原創作者的利益不受保障，長遠而言，社會整體的創新創作氛圍必然會受到影響，壓抑了創作熱情。事實上，政府所提出的版權修訂條例正正平衡了兩方面的需要，在對版權持有人的保障與時並進的同時，又加入眾多的豁免規則，保障了網民們在諷刺時弊等情況下的二次創作，以及網上分享不會被視為侵權。

比較一下政府於2011年提出的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會發現新草案比早年提出的方案大幅修改，更加保障網民們的正當權益。草案中已經很清楚地列明戲仿、滑稽；諷刺、模仿、引用及報道與評論時事這六大範疇可獲豁免，只有在創作同人誌漫畫及翻唱歌曲等危害到創作者利益，又在六大豁免的範疇以外，才可能觸犯刑責。

當然，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始終是一條高度技術性的草案，牽涉到複雜的法律概念、國際慣例及網上行為，並非所有市民都能夠輕易理解的，故特別容易引致誤會。所以，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必須加強相關草案的宣傳與解釋，聯繫各地區團體協助宣傳，深入群眾，爭取更大民意支持。如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獲得更大的民意認同，必然有助於遊說立法會議員支持。

對於一般市民來說，未能清楚了解修訂條例的內容尚可理解。但部分反對派人士，不僅自己對這次版權修訂條例的內容一知半解，還向市民發出錯誤訊息，誤導市民，把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污名化和政治化，扭曲所謂「網絡三條」，完全偏離事實，也完全不符立法原意。個別議員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竟再次在立法會拉布，就更加不可取。須知道，立法會尚有大量關乎香港發展和民生的法案待審議，拉布不但影響了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的正常審議，還會對其他草案構成影響，社會代價非常高，對市民又有什麼好處呢？難道議員的工作就是浪費時間、阻礙香港發展？

無疑，特區政府是有充足的理據通過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然而，在部分反對派團體別有用心誤導市民、挑起社會矛盾的情況下，政府更應該加強宣傳，讓普羅大眾更清楚立法原意及理據，以免社會繼續以訛傳訛。

炮製「種票」疑雲 輸打贏要圖翻盤

高天問

民主黨在今屆葵青區區選大敗，死不認輸，不檢討反省，反而通過《蘋果日報》血口噴人，抹黑民建聯靠「種票」取得勝利，企圖輸打贏要，推翻選舉結果。這種拙劣招數，只會讓選民更看清民主黨不尊重民主，不尊重選民抉擇，只會使用陰謀詭計插賊嫁禍，連黨格人格都一併輸了。

《蘋果日報》近日爆料說，郭芙蓉的選區增加了大量新登記選民，有重大「種票」嫌疑。民主黨打蛇隨棍上，隨即發表聲明譴責事件，認為「種票嚴重影響選舉公平，且涉刑事成份，促執法部門調查。」落選區議會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更多次不負責任地稱，他「覺得」、「懷疑」、「感覺」本次區議會選舉新增了不少流動選民，但又承認自己根本「冇數字」。另一落選的民主黨副主席尹兆堅，立即不肯承認選舉結果，宣稱會考慮覆核，提出選舉呈請推翻選舉結果。《蘋果日報》爆黑材料，指控「種票」的選區並不屬於尹兆堅的選區，尹兆堅的小動作，不過是含沙射影，誣導公眾，造成落選是受「種票」所害的假象。

「種票」疑雲「舊聞翻炒」

「種票」疑雲並不是什麼新鮮嘍頭，完全是「舊聞翻炒」。區議會選舉還沒有正式開始，9月份尹兆堅就大打「種票」牌，無中生有把一班原來是民主黨的義工，說成他們有搬遷地址「種票」的嫌疑，要求選舉事務處取消他們的選民資格。這實際上是一石二鳥之計。第一，借此抹黑對手

民建聯的候選人；第二，留下後着，一旦選舉輸了，就可以賊喊捉賊，將敗選歸咎於「種票」，可以提出選舉呈請，為輸打贏要埋下伏筆。

結果，尹兆堅被踢爆濫用選民登記舉報制度，試圖「老屈」街坊「種票」，弄到大批街坊被選舉事務處要求須於短時間內補交資料和地址證明，甚至要上庭答辯，給居民造成嚴重滋擾。尹兆堅的「老屈」行為激起民憤，大批葵涌石蔭區街坊要求尹兆堅認錯道歉，尹兆堅厚顏無恥，堅拒道歉。有關「種票」事件，後來法庭裁決，證明所謂「種票」不符合事實。如今民主黨夥同《蘋果日報》再度打出「種票」牌，只會讓選民更加清楚，有人濫用「種票」抹黑街坊、對手，落敗咎由自取。

對於《蘋果日報》有關郭芙蓉選區「種票」的報道，郭芙蓉已發表聲明，強調報道內容與事實不符，指參選期間並沒有做過報道所指的事情，她本人對該報道保留一切法律權利。《蘋果日報》說有14人的地址「最為可疑」。其實有的人在選舉之前，已經被郭芙蓉發現，已要求選舉事務處取消他們的選民登記。《蘋果日報》舉出的一個例子，更加露出自編自導自演的馬腳。一對支持民主黨的夫婦，向《蘋果日報》記者聲稱，他

中國需培育成熟的全球主義心態

陳迎春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戰略研究部博士

據說，近代中國積極倡導「開眼看世界」的魏源刊印出長達百卷的《海國圖志》後，當時清朝國內幾乎無人問津。這個陷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桎梏數千年之久的東方古老帝國，絲毫不知道這部劃時代巨著的價值，很多知識分子甚至斥之為「異端邪說」。然而此書傳入日本後卻引起巨大社會反響，人們視為奇書，爭相購閱。魏源的《海國圖志》直接推動着清朝人眼中的這個東瀛蕞爾小國以極大的熱情去了解他們此前一無所知的西方世界，從而掀起了「明治維新」的熱潮。如果再聯繫到幾十年後的甲午海戰中「天朝上國」一敗塗地，《海國圖志》在中日兩國遭受的不同境遇，又何嘗不是一個隱喻呢？

突破過時觀念和思維窠臼

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出國門，或留學，或商旅。根據有關部門的統計，僅在2014年中國出國留學的人數接近46萬，而2015年上半年出境旅遊人數就高達1.27億人次。海外閱歷大大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但是，當我們置身於外部世界，眼中所見到的到底是什麼呢？絕大部分中國人看到的無非是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對發達國家器物層面上的領先技術稱羨不已，但是對這些物質文明背後的支撐性基礎，即精巧的國際制度設計、深厚的現代文明理念等核心要素，感同身受的部分卻不多。相反，我們對「權力」、「國家利益最大化」等曾經在傳統工業化時代大行其道的理論學說和思維方式卻越來越迷戀，甚至奉若圭臬。比如，當西方國家已經全面主導了「海洋圈地運動」的進程時，我們很多人的思維還停留在「搶島佔礁」、「建設強大海軍」等觀念層面上，更有甚者公開呼籲中國要退出《國際

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制，反映出對「海洋國土」既是權利更是責任」的認知較少認同；當西方人開始在太空、極地、網絡等國際領域新空間制定博弈規則時，我們還只是以「看客」的姿態出現，鮮見提出能夠為各方所接受的倡議。

凡此種種，反映出我們的思維仍然沒有跳出陸權時代和農耕文化的窠臼。辛亥革命都已經過去100多年了，它剪掉了人們腦後的辮子，但很多人的觀念卻依舊停留在辮子滿街走的舊時代，正如電影《建國大業》辜鴻銘的一句台詞講的那樣：「你們只看到我的後腦勺上留有一根辮子，但看不到你們每個人心中都留着辮子。」觀念和思維上的巨大落差，仍然在無形之中影響了我們對外決策與行為的方式，也無端加劇了來自外界的隔膜和疑懼。相對於物質層面的進步，觀念和思維模式的實質性進步卻要難得多，但同時意義也要深遠得多。

培育成熟的全球主義心態

另外同樣值得反思的情形是，在當下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早已成為一門「顯學」，大學和專門研究機構進行國際問題研究的從業者甚眾，但很少有研究成果能夠在國際學術界佔得一席之地，相對於「美國學派」和「英國學派」，所謂「中國學派」也不太可能在可預期的將來展現出勃勃生機。新加坡著名學者鄭永年甚至斷言，當前中國國內精通國際事務的專家其實鳳毛麟角。這一窘境，反映出改革開放多年之後我們對這個世界仍然缺乏深度的了解，很多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研判，情緒化、狹隘化的結論居多，動輒以「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的眼光看待發展道路上的矛盾與問題，鮮有理性的、有價值的思考，體現不出一個快速崛起的東方大國應有的胸懷、氣度

和視野。著名文化學者周有光先生曾經說過，「中國文化的傳統有一個缺點，就是只講四海之內，沒有四海之外的觀念；中國是一個大國，可無論再大，也只是一個國家，世界上還有那麼多的國家，所以今天任何國家都不能單看本國，還要看世界，只有從世界來看本國，才能了解本國。」學術乃社會公器，而作為國際問題領域的學者，相對於一般民眾，更應該培育「四海之外的觀念」，「從世界來看本國」，為我們了解世界的變化提供令人信服的話語體系。福柯說，話語也是一種權力。而中國當前恰好缺乏這種權力，倘若沒有這種權力，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大國就很難贏得世界的普遍尊敬。

從這個角度看，北京大學王逸舟教授2015年底出版的《創造性介入：中國的外交轉型》，既是給普通讀者講述了一堂關於世界政治與中國外交的「必修課」，也給當前表面繁榮、實則貧瘠的國際問題研究注入了一股新鮮的風氣。他呼籲中國外交需要一場靜悄悄的革命，不僅要在器物更要在制度和觀念上進行轉型，搬走中國在走向世界、深度融入世界進程中的絆腳石。如果說當年魏源及其《海國圖志》給當時尚處於蒙昧時代的中日兩國進行了關於世界地理知識的啟蒙，從而敦促人們要「睜眼看世界」，那麼王逸舟教授這本精緻的小書則可以啟示我們在新的國際大勢面前，仍然需要果斷拋棄一些陳腐的觀念，打開面向世界的心靈窗戶，培育正常、成熟的全球主義心態，及時做好成為新型全球大國的準備。唯有如此，才能成為把自身的進步與民族復興，同整個世界向善的總體趨勢結合起來，走上一條新型的民族復興之路，向世人展示一個自信、和平而又包容的「世界之中國」。